

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

張家駒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

張家駒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57年·武漢

內容提要

本書從北宋政權的建立和南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、政治中心移動對南方社會的影響、南渡後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以及南方人材的勃興等情況，說明宋王朝的南渡標誌着南方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，并說明這一時期是我國歷史上經濟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時代。

1980.9.10.7

EE

目 錄

一、緒言	1
二、北宋政權的建立和南方社會生產力的發展	6
北宋統一的基礎——南方的農業生產——手工業的地理分布—— 國內與國外貿易——南北戶口形態——南方的沉重賦稅負擔—— 地主階級的繁榮——結語	
三、政治中心移動對南方社會的影響	41
趙宋政權的南渡——北方人口的南遷——各階層人物的南渡—— 中央官工業的南遷——北方風俗的南傳——結語	
四、南渡後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	67
南宋初農村經濟的恢復——手工業的發達——商業和城市的發展 ——統治階級生活的豪侈——人民負擔的沉重——結語	
五、金人統治下北方的殘破	103
北宋北方經濟的破壞——金人入侵及其屠殺政策——女真族對土 地的長期掠奪——繁重的賦役剝削——殘暴的政治壓迫——天災 襲擊的嚴重破壞——結語	
六、從人材勃興看兩宋南方經濟文化的發展	128
南方地主階級的抬頭——理學南傳及其在南方的發展——南方文 學的發達——史學、藝術和印刷——結語	
七、結論	155
附錄：宋史地理志路、州、軍區划表	

后記

一 緒言

我們祖國是一個面積廣大、具有無限天然資源與眾多人力的國家，自古以來就具备了建立強大國家的優越條件。歷史上大約在四千年前，由於我國勞動人民辛勤創造的成果，出現了古代的燦爛文化，正如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說：

“中華民族的發展（這裡說的主要地是漢族的發展），和世界上別的許多民族同樣，曾經經過了若干萬年的無階級的原始公社的生活。而從原始公社崩潰，社會生活轉入階級生活那個時代開始，經過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，直到現在，已有了大約四千年之久。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，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，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、文學家和藝術家，有丰富的文化典籍。在很早的時候，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。還在一千八百年前，已經發明了造紙法。在一千三百年前，已經發明了刻版印刷。火藥的應用，也在歐洲人之前。所以，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，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。”[●]
正因為我國文化很古就有盛大發展，我們的祖先在不同時代

● “毛澤東選集”第2卷616—617頁，1952年人民出版社版。

不同環境下進行勞動，不斷地發展了社會生產力，逐漸擴充了活動範圍。這樣在歷史悠久、土地遼闊、人口眾多等條件下，我們祖國各个不同區域的經濟，便具有各種程度發展不平衡的特徵。如果將我國版圖劃分為南北兩大區域，就可看到南方經濟的興起，在歷史上是遠遠落後於中原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它的興起雖然較晚，而滋長繁榮却是迅速的。大約在我國封建社會階段的中期，南方發展不獨已經趕上北方，並且進一步大大地超過了，形成一個南方經濟文化的鼎盛時期。

公元八世紀後期至十二世紀初間——即自唐朝中葉至宋之南渡，是我國經濟重心向南轉移的過渡時代。本篇的寫作，主要在闡明兩宋時期這一轉移的行程，但在說明本題之先，有必要將前一階段的南北經濟文化，首先加以概括敘述。

遠古我國石器文明，最早出現是在河北、山西等地，著名的彩陶文化分布於黃河兩岸，黑陶文化的基地是在山東海濱；河南鄭州二里崗、安陽的小屯，有著豐富的殷代文物遺址。南方的印紋陶，可能是由新石器時代晚期、一直延續到漢代的產物。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說，直至二千六百多年前的春秋時代，建立在長江中游的楚國，文化才開始趕上諸夏；吳國和越國的強盛，更下延至春秋的後期，這些南方國家的開化，都較之中原的諸夏為晚。入公元前五世紀末的戰國時代，楚國不斷開拓江淮疆土，對南方的開辟，貢獻很大。所謂“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淮之利”[●]，在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下，

● “史記”40“楚世家”。

出現了祖國偉大的人民詩人屈原，和風格优美的新文学——“楚辭”；近代出土的燦爛底楚文物，充分表現出戰國时代南方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。这些成就，也是通过五个世紀以來的种族斗争与融合，使華夏文化逐步擴大的結果。

閩江及珠江流域地区，等到秦朝中央集权封建統一國家的建立，才正式置为郡縣。始皇嬴政派遣五十万人南戍五嶺，这是歷史上第一次嶺外大移民。西漢初年，南方的冶金、煮鹽工業有了進一步發展，例如吳國的冶鐵、鑄錢，这时都很發達。到了东漢，牛耕方法逐漸从中原向周圍落后地区傳播，在今安徽廬江一帶的農民，初次掌握牛和犁的耕作技術；养蚕和紡織，同时也在南方發展起來。先進的生產技術，在人們辛勤劳动下，逐漸从黃河流域推廣到長江以至珠江流域了。可見兩漢时代南方生產力有了長足的進步。漢末中原陷入統治階級內部大混战的局面，北方社会遭受空前浩劫，形成人口的大量南流。在開發东南經濟的基礎上，建立起与魏、蜀鼎峙的东吳封建割据政权，这个政权支持了半个世紀以上；長江流域的劳动力有了顯著增加，同时生產技術落后情况獲得部分克服，在孙吳統治集团大力推动下，东南地区的經濟文化，較之东漢时代前進了一大步。

从公元第四世紀初叶起，我國北部在一百三十六年之間，先后为西、北落后各族所分割占据，釀成“五胡十六國”的混乱局面。东晋政权被迫南迁，北方長期混乱当中，在胡、漢貴族地主操縱下的种族仇殺与掠夺之余，嚴重地摧殘了它的社会生產；歷史上空前規模的人民大流徙爆發，这一歷史事件就成为南方經濟急剧發展的信号。此后，由于政权南移后、

統治階級加緊其對南方人民的剝削來支撐其偏安之局，事實上連南朝在內共計支撐了凡二百七十年之久。在這期間，許多荒地陸續被開發，手工業如紡織、冶鑄等也發展了起來，於是南方生產獲得迅速發展，成為我國新的財富之區。南方無論在經濟、文化上雖較後起，而处处均與北方相埒，長江流域經濟逐漸趕上黃河流域，造成南北对立的形勢；就在這個基礎上，形成長期對峙的南北朝時期。

隋唐帝國之所以強盛，與長江流域的發展，把中國封建經濟地盤至少擴大了一倍，並且以此為基地，繼續向閩江、珠江流域逐步擴大，關係非常密切。在隋朝，加上了溝通南北大運河的開辟：這條經過幾百萬勞動人民用血汗築成的大運河，一方面固然是南方發展的時代產物，而在另一方面，它不特緊密地聯繫着南北經濟、政治和軍事，因而奠定南北統一的基礎，同時通過南北物資、文化的交流，又促進了南方社會的進步，意義十分重大。其在唐朝，則有中葉的安祿山、史思明的變亂。這次變亂，一方面是唐帝國衰敗和崩潰的起點，同時又是我國經濟發展南盛北衰的一個轉捩。由於這一變亂具有強烈的種族鬥爭意義，落後種族對漢族人民的迫害是殘虐的，所以在戰爭展轉進行的黃河流域，就因戰爭的破壞與掠奪，特別呈現經濟蕭條的景象。北方人口又一次向南流徙，促使南方農業和手工業生產，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迅速發展起來；商品經濟日漸蓬勃，揚州、成都分別形成空前繁榮的城市。這時候唐朝中央政府財政的仰給，也只有四川、荊湖、閩廣和江淮等地，所謂“今賦出天下，江南居十九”[●]。江南的經濟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上升，而江南人民的

負擔却是十分沉重的。

繼承唐朝的“五代十國”，事實上是唐末藩鎮割據的延續。在數十年大分裂狀態中，黃河流域繼續受軍閥戰爭的破壞，呈現出戶口流移、田疇荒廢的景象；北方邊境又為契丹統治者侵略，遭到蹂躪和劫奪；再加上河道屢次潰決，漂溺田舍人畜，廣大的中原沃土，就因耕地面積大量縮小，人民顛沛流離，變成了貧瘠荒蕪的地域。然而在這種情況下，統治者對人民的殘酷壓榨，還是有增無已。至於建立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諸封建王國，雖在唐末也曾受過戰爭的摧殘，但從各國政權建立以來，這些新興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，在南方相對安定的環境下，實行了一些有利於生產發展和安定社會的政策，例如興修水利，獎勵耕織，使南方的經濟文化，雖然在“五代十國”的混亂局面中，仍能繼續向上發展，並且在長期過程的積累上，進一步奠定南方經濟超越北方的優勢地位。

兩宋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統一帝國的再建，構成我國封建經濟高度發展時代，也是我國經濟重心完成其南移行程的時代。宋王朝的南渡，標誌着南方經濟文化的空前發展，隨著政治中心的南移，我國社會就完全進入南盛北衰的新階段，因此，這一歷史事件，就成為我國南部發展歷史中的划時代關鍵。

● “全唐文”555，韓愈“送陸歙州詩序”。

二 北宋政权的建立和南方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

北宋統一的基礎 趙匡胤所建立的北宋政权，是在怎样条件下重新建立起中央集权封建統一帝國呢？要回答这个問題，我們必須觀察当时的經濟發展情況。北宋建立时所承襲的根据地，是經過后周政权整頓和發展的中原地区。五代后期戰爭較少，曾受嚴重破壞的北方經濟漸次恢復；后周的統治者郭威、柴榮，先后实行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的改良措施。例如郭威的提倡朴素生活，停罢各道加重对人民剥削所進的“羨余”物色，以無主荒田授給流散飢民并免其課役；又將中原屯田的土地、房屋、耕牛等，分配給原有佃戶作为永業，據說在一年之間，分到土地的農民共有三万多戶。世宗柴榮繼立，更進一步整頓內政，惩治貪污，取消免稅特權；又勒令各地僧尼還俗，使他們加入生產隊伍。公元九五五年下令：凡逃戶莊田許人承佃，如三年內本戶來歸，交還莊田一半；五年內來歸的交還三分一。从外族統治区來歸的田主，五年內來歸的交還三分二，十年內交還一半，十五年內交還三分一—。这些措施，一方面將游離于生產外的人戶吸收到生產崗位，

● 參考“舊五代史”“周書”“太祖紀”、“世宗紀”。

同时又擴大了耕地面積，保証了農業生產量的增加，对于黃河流域經濟的恢复和发展，起着重大的作用。

但是，后周政权所以獲得巩固，世宗之所以战胜契丹族，奠定北宋統一的基礎，并不全靠黃河流域經濟的恢复和发展，而是同时依靠了九五八年淮南十四州的合并。淮南地区自唐的后期便發展为帝國經濟重心的一部，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，重要的稅收物資——鹽，產量丰富。中唐以后由于統治者專力剝削东南的結果，淮南的荣枯一直关系着全國的財政命脈。自从唐末楊行密割据以來，統治者在“保境息民”政策指導下，实行休兵息民，招撫流散，励行節約，輕賦薄斂，很快就恢复了唐朝后期的富盛。本來是“兵火之余，江淮之間，东西千里，扫地尽矣”。不到几年，已經是“公私富庶，几复承平之旧”。以后經進一步的恢复發展，就形成“曠土尽辟，桑柘滿野”的局面。周世宗迫使南唐割讓这一区域，大大增强了后周的國力；也給兩年后开國的北宋，巩固了武力統一全國的物質基礎。

北宋統一战争的战略計劃是“先取其易”，亦即所謂“先南后北”。当时在廣大的南部地方，有南唐、吳越、荆南、湖南、南漢、后蜀等割据諸國，大部分統治者已暴露出腐朽無能，从北宋夺取政权后，他們更是岌岌不能自保。在北方有着强大的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，西北有党項所建的西夏；在鄰近兩國的山西，有在契丹卵翼下的割据國家北漢。宋太祖衡量了双方的軍事力量，自以沒有把握制勝遼、夏兩國，便决定

● “資治通鑑”259、270。

首先夺取南方，留着北漢作为三國間的緩冲地帶。此外，還有另一重要原因，就是当时四川、荆、廣、江南等地区，已經成为关系全國命脉的財富之区，这一地区的归并，使五代混乱时期中原財政的枯竭現象，宣告泯除；同时北宋統治权的巩固，也有了可靠的保証。所以宋太祖对他的弟弟趙光义說：“中國自五代已來，兵連禍結，帑藏空虛，必先取巴蜀，次及廣南江南，即國用饒矣。”●当然，这种策略完全是从統治階級利益出發，北宋政权一开始就不能繼承周世宗的北伐遺志，对北方的种族压迫采取怯懦的守勢，留給以后國家民族以嚴重的灾禍。——但是，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則为北宋的立國，仍然是建筑在南方財富的基礎之上。

南方的農業生產 自从中唐以來，封建政府憑借腴削东南來供应西北，对促進北方生產措施抱消極的态度，使北方農村日漸衰落，生產瀕于荒廢。以关中地区的鄭、白渠为例：秦漢时兩渠溉田四万四千五百頃，到唐朝大曆初（公元七六年）只得六千二百多頃●。直至北宋时代，同样因为“國家根本，仰給东南”●，假如这里的農業得不到發展，整个政权就不能支持下去，这样受到統治階級重視的結果，政府努力实行了發展生產的政策，人民辛勤劳动的結果，使南方農業生產在唐末五代基礎上，進一步發展起來。北宋时的南方，号称土地肥沃，而物產丰富，如：

兩浙——“吳中地沃而物穉，稼則刈麥种禾，一歲再熟，

● 王偁“東都事略”²³，“傳論”。

● “通典”¹⁷⁴。

● “宋史”³³⁷“范祖禹傳”。

稻有早晚。”①

淮南——“土地膏沃，有茶、鹽、絲、帛之利。”

荆湖——“土宜谷稻，賦入稍多。”

福建——“民安土乐業，川源浸灌，田疇膏沃，無凶年之憂。”②

我們可从下列几方面証明當時農業中心的南移：

(1) 水利的兴修 水利建設，既能夠擴大灌溉面積，促進農作物的增產，又能防止水旱灾害，避免農作物的減產，因此水利工程的興修，往往成為農業生產發展的標誌。北宋南方水利的開發，是有着顯著成就的。在全國恢復統一政權獲得相對穩定條件下，各地方政府曾先後領導人民群眾，在這裡進行了各種規模的水利工程。特別如兩浙是當時首富地區，愈發受到封建統治者的注意。這個地區在北宋時建設的較大規模水利，就有江北捍海堰、江南海塘、錢塘江堤、西湖等處。捍海堰在今日的蘇北沿海，全長五百多里，北宋中葉范仲淹做興化縣官時，在朝廷支持下，發動通、泰、楚、海四州民夫修成，保衛靠近海濱一帶民田，免遭海潮倒灌之患，同時使沿海許多咸鹵的土地，得以改造化為良田，“宋史”“張綸傳”謂堤成後流逋歸者二千六百余戶。浙江捍海石塘創于五代時的吳越，北宋建國後七十多年，淪為“積久不治，人患墮溺”的形勢，張夏來作轉運使，置捍海兵士五指揮，以二千人為額，專一采石修塘，隨損隨治，眾賴以安。錢塘江堤則前後經過多次修築，真宗統治時發運使李溥主持下的一次，

① 朱長文“吳郡圖經續記”上。

② 俱見“宋史”89“地理志”。

吸收五代防潮經驗，用石塊放在竹籠內，壘砌成堤，打上木椿，對於捍衛沿江民田，起着重大作用。西湖在杭州城西，溉田面積千余頃，哲宗時歲久湮廢，蘇軾來作知州，便領導群眾開濬湖底，疏導茆山、鹽橋二河，修造堰閘以蓄泄潮水，修復六個水井，筑“苏公堤”成，一時附近農田，均獲其利。此外，真宗時徐廩做蘇州通判，領導人民建築石堤九十里，起橋梁十八座，復良田數千頃。他又曾經修築太湖石堤，疏濬通海的支渠以排泄積潦，自吳江以東至海，流民復業的共計二萬六千戶。可見水利的興修，一般都是收效顯著的。

(2) 農業的商品化與專門化 南方的地理條件是優越而多樣化的，農產品的種類繁多，產量都很豐富，隨著自然條件的差異、交換的發達和商品生產的發展，農作物的產區已開始創立其專門化的过程，單位面積產量也顯著地增加。現在，農民不僅要生產自己需用的生活資料，而且生產着在市場上可供出賣的商品。這種情況，表現在南方大量食糧的輸出和各種經濟作物的普遍栽植上，都是明顯可見的。稻米是南方種植的主要糧食作物，由於各個地區具體條件的不同，米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，產米最豐的地區是兩浙，兩浙又以蘇、湖、常、秀等州為中心。蘇州一帶，普通年成每畝平均產米三石，可見江南單位面積產量之高了。產量次多的是江淮，淮南每年“上供”食糧數額，僅次於兩浙。此外江南、荊湖、福建、廣南等路，都號稱為“土多秔稻”[●]，除去閩、廣，也都是稻米大量輸出的地域。

● “宋史”174“食貨志”。

在河谷平原或廣泛分布的丘陵地上，發展了許多有价值的經濟作物。南方著名的經濟作物，像生絲、苧麻、茶叶、水果……之类，品种繁多。茶叶是南方普遍的農產品，因为適宜生長在熱帶和暖溫帶的多雨丘陵；它不但獨占了全國的市場，并且大量向國外輸出。北宋茶的品名至多，以福建所產為最著，當時有句話說：“建安茶品甲于天下。”[●] 其中品質最好的龍鳳團茶，一斤價值黃金二兩。兩浙以日注茶第一，江西以双井白芽最有名，湖北有荊州松滋縣碧澗子茶餅、茶芽，淮南有舒州的開火茶，廣西有容州的竹茶等。此外如江東的歙、池、江、饒，江西的虔、吉、袁、筠，淮南的廬、和，湖北的鄂、安、峽、歸，四川的巴、瀘……等州，都以產茶區著。水果是專業性的商品生產，南方的溫帶、暖溫帶果实，北宋時不但種類繁多，而且分布極廣[●]：

橘——產于兩浙的杭、衢，江西的吉州，湖南及湖北的荊州。

柑——產于湖南及湖北的荊州，廣東的廣州；此外佛手柑產于福建的福州，乳柑產于兩浙的台州。

朱橘——產于江西的撫州。

金橘——產于江西和福建。江西的金橘最有名，香清味美，商人運至京師高价出售。

甘橘——產于兩浙的越州，江西的洪州。

荔枝——產于福建、廣東和廣西等路。福州的產量為當時第一，有江家綠、藍家紅、周家紅、何家紅、

● 子安集“試茶錄”。

● 本表列舉的都是最著名的產地，俱見宋人筆記。

法石白、綠核、大丁香等，種類甚多。

龍眼——產于福建的福、泉，廣東的循州，廣西的梧州。

甘蔗——產于兩浙的越州，福建的泉、福。

蕉——產于福建的泉州，廣東的梅州，廣西的昭州。

橄欖——產于福建的福、泉，廣西的邕州。

羊桃——產于福建的福州。

枇杷——產于福建的泉州。

雪梨——產于江东的宜州。

雪瓜桃——產于江西的虔州。

栗——產于江东的江州。

余甘子——產于廣西的欽州。

(3) 漕運數量的擴大 漕運是統治集團對南方人民榨取的方式之一。從唐代開始，漕運南方食糧接濟北方，就逐漸重要；但當時漕運最高年額，至多只三百万石。北宋數字不斷增多，最高紀錄竟達七百萬石，比較唐朝後期提高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強。平均年額也在六百萬石左右。漕糧數字的增加，雖然因為兵力集中京畿的緣故，也說明北方農業生產日益雕敝，以致產生嚴重的缺糧現象。同時這一情況，又牽涉到北宋建都問題，當時所以選擇汴京的原因，主要是依靠汴河水道運輸，來劫奪東南的食糧。張洎說得好：“今帶甲數十萬，戰騎稱是，萃于京師。仍以亡國之士民，集于輦下，比漢唐京邑繁庶，十倍其人矣。旬服時有水旱而不致艱歉者，有惠民、金水、五丈、汴水等四渠，派分脈引，會于天邑。舳艤相接，贍足京師，以無匱乏也。唯汴之水，橫亘中國，首承大河，漕引江湖，利盡南海；半天下之財賦，并山澤之

百貨，悉由此路而進。”●除去京城以外，附近人口稠密的都邑——如南京应天府、京东的拱州、开封府陈留……等处，也同样仰賴于南方的漕运。另一方面，除去政府漕粮之外，富商大贾，也在从江淮贱買杭稻轉运京师，坐邀厚利；这种私运的食粮，就更無法統計了。通过漕运，統治集團將东南人民的膏血，源源不絕地榨取北运，这便造成南方粮价高涨，人民生活水平低降，即所謂“谷貴民貧”的現象。

为什么南方農業獲得如此重大發展呢？首先，南方本來具有許多有利于生產發展的优越条件，例如肥沃的平原面積异常廣大，丘陵和山地一般海拔不高，有着無數寬谷盆地，也多半宜于耕作，气候大体温和潤澤。經過隋、唐、五代以來的開發，南方的劳动力增加，耕地面積擴大，耕作技術有了很大改進；加上北宋國內的長期穩定，全國範圍內的農業獲得進一步發展，南方自然不能例外。其次，北宋王朝在其恢复和發展農業生產措施中，特別重視了东南这一地区的開發。上面說到的水利工程建設，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，事实上北宋从統一江南起，自始即在南方实行獎励垦殖政策，或則采用減免課役的办法，如九九〇年令江南、兩浙召游民，劝其耕种，准免租稅徭役五年●。或則發給谷种和借貸，其中一〇一二年的一次，为了預防旱灾，政府派人从福建取占城旱稻种，分給江、淮、浙三路，令農民擇地勢較高的土地蒔种，并將种植方法寫成榜文公布，指導農民耕作，更含有

● 李焘“續資治通鑑長編”（以下簡称“續通鑑長編”）38。

● “宋會要稿”“食貨”之63。